



近世译书对中国现代化的影响

钱存训著 戴文伯译

本文原著发表于英文《远东季刊》第十四卷第三期（1954年），中文译文载香港《明报月刊》第九卷第八期（总104期，1974年8月号），原题《译书对中国现代化的影响》。现经作者校订译文，交本刊发表。本刊对标题和文内个别地方的文字，做了些改动。

作者钱存训博士，现为美国芝加哥大学远东语言文化系和图书馆学研究院的荣誉教授、远东图书馆荣誉馆长。

——编者

翻译不仅是一门科学或一种艺术，也是人类知识交换和国际文化沟通的一种实际工具。由于近代文化背景不同的国家接触频繁，翻译的价值更趋重要。西方各国虽然语言各异，但有共同的文化背景作为基础，所以翻译上的问题，多从语言的观点来研究，而无须从文化的差异来探讨。至于东西文化的沟通问题，不仅有语言上的障碍，且以文化类型迥异，就困难更多了。

西书移译为中文，开始于十六世纪的末叶。由于宗教热忱的鼓舞，耶稣会士发韧译事于前，新教传教士继起于后。自十九世

纪中叶以来，翻译一事成为中国政府走向现代化的一种特殊措施，因此翻译的题材和原著的来源，常常反映出近代中国思想界的大势以及政府政策的方向。至于各时期译书的性质和数量，也可看出译书的动机和知识界兴趣的一般趋势。

近代中国的许多政治家和知识界的领袖，每多不谙外国语文，他们的西方知识，大多来自中文译本。从清末以来的各种译书目录，可见翻译在中国的特殊重要性。中国学者对于目录学的观念，向来重视其中著录的内容。所谓“辨章学术，考镜源流”，实际是一种内容分析（Content Analysis），这与现代所谓“统计目录学”的理论极为相似，即从分析书目的内容，进而追溯文化的长成。本文主旨即在以统计学方法，研究和分析译书在中国近代史上所反映出来的西方文化，对中国现代化所发生的影响①。

一、耶稣会士的译著

十六世纪末叶，西方知识在中国的出现，标志着从佛教传来以后第二次外来文化的大输入。在紧接着的两个世纪中，至少有八十名不同国籍的耶稣会士参与翻译西书为中文的工作，先后译书四百多种，所涉及的范围，对中国人而言，都是新的知识领域。这些译著有半数以上是关于基督教教义，三分之一是各种科学，其余是关于西方制度和人文科学（见表一）。因此很明显，耶稣会士译书的主要动机是为了传扬教义。在会士们的译著中，最早是罗明坚（Michel Ruggieri）的《圣教实录》，此书在一五八二年撰成，一五八四年在广州刊行，是西方人用中文在中国出版的第一部书。一五九六年利玛窦（Matteo Ricci）在他的《天学实义》中，将基督教与儒家思想相联系，从中国经典中采集了许多支持基督教教义的章句来加以引申。又为了适应中国人对天文和数学

表一 耶稣会士的译述 1584—约1790

译述种数					
科 目	十六世纪	十七世纪	十八世纪	总数	百分比
基督教(或天主教)				251	57
圣经	—	3	3	6	
神学	6	119	18	143	
仪式	1	49	9	59	
史传	—	23	6	29	
杂录	—	11	3	14	
人文科学				55	13
哲学和心理学	1	7	1	9	
伦理	1	9	—	10	
政府	—	2	—	2	
教育	—	4	—	4	
语言和字典	2	6	1	9	
文学	—	1	—	1	
音乐	—	1	1	2	
地理和舆图	1	9	3	13	
杂录	—	5	—	5	
科学				131	30

续上表

数学	—	16	4	20	
天文	—	83	6	89	
物理	—	6	—	6	
地质	—	3	—	3	
生物和医学	—	8	—	8	
军事科学	—	2	—	2	
杂录	1	2	—	3	
总计	13	369	55	437	100

附注：(1)表中所列数字仅代表个别的译述或原稿，重印的版本不包括在内。

(2)资料来源：Louis pfister *Notices biographiques et bibliographiques sur les Jesuites de L'ancienne mission de China, 1552—1773*(Shanghai:Imprimerie de la mission Catholique,1932—34),2 Vols;Henri Bornard“Les adaptation chinoises d'ouvrages europeens, 1514—1688,”*Monumenta Sorica*,10(1954), 1—57, 309—88.

的重视,更翻译这方面的许多西方著作,借以抬高西方文化在中国的地位。当一六〇七年《几何原本》第一次在中国印行的时候,会士们认为此书的出版,“正合时机,借以降低中国人的自傲心理;因为虽名儒俊彦,亦得承认,他们阅读一本印着中国文字的书,虽一再钻研,仍不晓其意义”②

一些具有西方科学知识的中国学者,先后帮助耶稣会士进行

译述工作。那时通常译书的办法，是由西人口述，华人笔录，前者称为“口译”或“授”，后者称为“笔受”或“演”。在这些中国学者中，徐光启于一六〇五年开始和利玛窦诸人合作，翻译科学著作不下十种。李之藻亦致力于科学研究，他所编的《天学初函》（一六二九年），收西人译著十九种，是最早的一部关于西方学问的中文丛书。王徵致力于应用科学的研究，探寻西方机械设计知识来改进农具，在他的译述中，有些专门名词和术语，至今仍在沿用。

利玛窦用中文撰述和译书不下二十多种，他所译克拉维斯（P. Christophus Clavius）注释的欧几里德《几何原本》（前六卷，一六〇七年）《四库总目》推崇为“弁冕西术”。他的《西国记法》（一五九五年）是第一部用中文撰述有关心理学的著作，此书指出“脑”才是记忆的所在，并非如中国传统认为“心”是记忆的部位。但他对中国最大的贡献，也许是他的划时代巨构《万国全图》（一五八四年）。此图是据奥提力阿斯（Abraham ortelius）的《舆图汇编》所绘制，由此中国人对世界地理的知识得以扩大。另一位意大利人熊三拔（Sabathin de Ursis）以介绍西方水利技术而被称誉，在他的《泰西水法》（一六一二年）中，采用机械图式来加以解说。至于他的《药露记》（一六一七年），也许是中文关于西方药物学的一本滥觞之作。

金尼阁（Nicolas Trigault）对中国语音学的研究颇有贡献，他的《西儒耳目资》（一六二六年），是一部最早试将中文拉丁化的著作。他所译的《况义》，即《伊索寓言选集》（一六二五年），是第一部介绍到中国的西方文学作品。和他同时的龙华民（Nicholas Longobardi），其所著《地震解》（一六二六年），对天启四十九年的地震作了一项科学的解释。高一志（初名王丰肃，Alphonse Vagnoni）所译亚里士多德的《空际格致》（一六三三年），是关于气象学的第一部中文译述。他的《西学治平》

(一六三〇年)，是最早用中文有系统介绍西方政治科学的书。首先介绍西方教育的，是艾儒略 (Julius Aleni) 的《西学凡》(一六一三年)，其中记载了欧洲大学的课程和制度。他的《职方外纪》(一六二三年)，是最早用中文撰述关于世界地理的一部著作。傅汛济 (Francois Furtado) 介绍了西方的逻辑，所译的《名理探》(一六三一年)，是亚里士多德哲学的一部份。邓玉函 (Jean Terrentius) 所译的《人身概说》(一六二五年)，是首次介绍西洋解剖学并以中国医学理论来作对比。邓氏的《奇器图说》(一六二七年)，是一部关于机械的重要译述，此书是根据四种有关机械的底本编译而成。到一六四二年即伽利略 (Galileo) 逝世的那一年，伽氏和其他科学家在物理学方面的若干新发明，诸如望远镜、地平仪、温度计和气压计之类，那时都已传到了中国。

明朝灭亡和清人入关，对耶稣会士的地位并没有多大改变。例如汤若望 (Jean Adam Schall Von Bell)，起初为明廷雇用，后来继续为清朝服务。他不但设计天文仪器和制造銃炮，而且也有大量的译述。一六二六年，他译《远镜说》的时候，中国的第一架望远镜即是由他传入。一六四〇年，他译《矿物寻源》，这是讨论科学探测矿物资源的第一部中文译本。和他同时的利类思 (Louis Buglio)，是首先介绍西方动物学的译述者，当葡萄牙人于一六七八年向清廷进贡一头非洲狮子的时候，他从阿觉文提 (Ulisse Aldrovandi) 的博物学中，抽译有关鹰和狮的两部份，而成《狮子说》与《进呈鹰说》二书。最初介绍球面三角学和对数的是穆尼阁 (Jean-Nicholas Smogolenski)，在他撰述的《天学会通》(一六五六年)中，开启了用西方计算日月蚀的方法。另一位颇具影响力的耶稣会士南怀仁 (Ferdinand Verbiest) 所撰的《坤輿图说》(一六七二年)，进一步提供了关于世界地理的知识。至于他译的《眼科解剖》(一六八二年)，

可能是第一部关于眼科的中文译本。

一六八八年南怀仁逝世后，虽然耶稣会士仍继续来到中国，但他们的中文译著不多。十八世纪的译著，多系关于神学方面的；同时，他们又致力于将中国经籍移译为西方语文。但有一项成就特别重要，便是在十八世纪初期，会士们集体绘制了一部中国全图，即《皇舆全览图》。从一七〇八至一七一八年，先后有十多位耶稣会士参与是项工作。这是我国首次作全国性的勘测地形，该图成为后来绘制中国舆图的主要蓝本③。

二、新教传教士与译书

经过一段几十年的中断时期，在十八世纪末和十九世纪初期，新教传教士继续耶稣会士留下来的工作。虽然他们大体上遵循耶稣会士译书的方式和技巧，但译述的性质和品质颇不相同。耶稣会士多和士大夫相交，而新教传教士主要和商人及平民往来。因此传教士的译著，大多是为传教用的通俗性小册子和学校课本。虽然数量很多，但他们译述的品质不能与耶稣会士的相比。这或许是新教传教士除了医生极少数人以外，不像耶稣会士在科学方面都有相当的素养，而他们所合作的中国人士，又大多不是卓越的学者。在一八一〇和一八六七年间，所有传教士的译著，除了百分之十二涉及西方科学和制度外，其余全系有关基督教教义的译述④（见表二）。

新教传教士最早的中文出版物是马礼逊（Robert Morrison）译的《使徒行传》，这是根据耶稣会士的旧译抄本所修订，于一八一〇年第一次印行。传教士在中国早期的传教工作，是与翻译圣经分不开的，因为耶稣会士没有将圣经全部译成中文，直到十九世纪初期才有中文全译本《新旧约全书》问世。一部是马士曼（Joshua Marshman）所译，一八二二年在印度塞拉姆浦尔（Se-

表二 基督教(或新教)传教士的译述 1810—1867

出版种数				
科目	文言	方言	总数	百分比
基督教			687	86
翻译圣经	28	37	65	
注释圣经	30	3	33	
神学	344	74	418	
使徒传记	11	37	48	
圣教问答	37	16	53	
祈祷	17	14	31	
圣诗	18	21	39	
人文科学			46	6
政府	2	—	2	
经济	2	—	2	
语文和课本	11	8	19	
历史	6	—	6	
地理	14	3	17	
自然科学			47	6
数学	8	1	9	
天文学	6	1	7	

续上表

历书	12	—	12	
物理学	4	—	4	
植物学	2	—	2	
医学	13	—	13	
杂录	13	2	15	2
总计	578	217	795	100

附注：(1)表中数字仅代表书籍和小册子，杂志上的翻释文章未包括在内。

资料来源：Alexander Wylie, *Memorials of Protestant Missionaries to the Chinese*(Shanghai American Presbyterian Mission Press, 1867). PP. 314—31.

rampore)用铅活字版印行；另一部是马礼逊所译，一八二三年在马六甲刊行。除了宗教方面的编译外，也有关于外国史地和制度的译述，如麦都思(Walter H. Medhurst)编的《东西史记和合》(巴达维亚，一八二九年)，是最早使用石印术印刷的中文书之一。该书将中国史迹与圣经记载平行排列，以示中国史迹与圣经记载有相同的地方。据说，“此书之作，目的在纠正中国人的狂妄夸大，以示西方有早于耶稣纪元前四千年的记载”其他如裨治文(Eljah C. Bridgman)编的《亚美利哥合省国志略》(一八三八年)，是第一部提供中国人对美国人了解的书。其他介绍西方国家的译述，有郭实猎(Karl F. Gutzlaff)的《大英国统治》(一八三四年)、《古今万国鉴》(一八三八年)，和《万国地理全集》(约一八四〇年)，这三部书曾经几次修订和重印。郭

氏的《制国之用大略》（约一八四〇年）和《贸易通志》（一八四〇年），加上马礼逊的《英事撮要》（马六甲，一八三三年），是十九世纪前半期介绍西洋制度最重要的几部译著。

在数学、天文、医学和其他科学方面，新教传教士所译的重要著作，直到一八五〇年后才出现。伟烈亚力(Alexander Wylie)在数学方面有相当贡献，特别是完成欧几里德的《几何原本》第七至十五卷的译本。伟氏又和李善兰合译棣么甘(Augustus de Morgan)的《代数学》（一八九五年）、罗密士(Elins Loomis)的《代微积拾级》（一八五九年）和候失勒(John F.W. Herschell)的《谈天》（一八五九年）。李氏亦同艾约瑟(Joseph Edkins)合译胡威立(Whowell)的《重学》（一八五八年）和《圆锥曲线说》（一八六六年），并与韦廉臣(Alexander Williamson)合译林德利(Lindley)的《植物学》（一八五九年）。在这些译作中所创立的若干科学名词，至今仍在沿用。

新教传教士对近代中国医学的发展有足多的贡献，如合信医生(Dr. Benjamin Hobson)的五部主要编著，《全体新论》（一八五一年）、《博物新编》（一八五五年）、《外科新说》（一八五七年）、《妇婴新说》（一八五八年）和《西医略论》（一八五八年），构成一套全编，多年来在中国一直视为标准的医学著作，并曾经日人翻译。以后，嘉约翰医生(Dr. John Glasgow Kerr)也编译了不少关于外科、药理学、梅毒、眼科、妇科和炎症等医学书籍⑤。

传教士的译著，多由教会自办的印刷所出版，最初在中国的辖区之外开办，一八四二年鸦片战争之后，便迁移到中国的各口岸城市。在一八九五年至少有十四处设有教会的印刷机构。最早从事译印工作的是伦敦传教会印刷所，原由马礼逊和米怜(William Milne)于一八一八年前后在马六甲成立，与英华书院同属一系统。这个印刷所后来迁到香港，再移到上海，以墨海书馆名

称从事译印。一八四七年，该馆在伟烈亚力监督之下成为教会的编译和出版中心，直到后来由美国长老会印刷所接办。这间美国长老会印刷所原于一八四四年在澳门成立，一八六〇年迁移到上海，在该地以美华书馆名称从事译印，由姜别利(William Gamble)任监督。从一八九一至一八九五年间，美华书馆出版品的总数，约有百分之七十是关于医学、科学以及字典和教育方面的译著。另一从事译印较著名的教会组织，是一般人所熟知的益智书会(Society for the Diffusion of Christian and General Knowledge)，后易名为广学会(Christian Literary Society of China)。该会为韦廉臣于一八八七年创办，后由李提摩太(Timothy Richard)继续主持，目的在编印一套适合教会学校通用的课本和普通读物，广学会因出版若干刊物而著名，如《万国公报》，是一种政治和宗教性的月刊，由林乐知(Young J. Allen)主编；《益智新录》，是一种科学月刊；《中西教会报》是一种教会的机关刊物。至于《东西洋考每月统计传》，一八三三年创刊于广州，是教会在中国境内出版的第一种华文杂志，后由广学会继续刊行。

教会的出版物，起初没有引起中国学者的注意，因为他们认为那只是宗教性的宣传品。这种态度在一八九五年甲午战争后有所转变，因广学会出版了一部《中东战纪本末》，由林乐知编撰，报导翔实可靠。后来李提摩太译了麦肯济(Mackenzie)的《泰西新史揽要》，据说曾销到一百万册。教会为了传教，需要大量的出版品，特别是《圣经》，于是他们试用西方活字版的技术来印刷中文，镌刻字模，浇铸中文铅字和使用印刷机。因此，铅印术和石印术二者对近代中国出版事业产生了重大的影响⑥。

三、政府和私人的译书机构

十九世纪中叶，中国政府机构也开始从事译书工作，因而翻

译的趋势有了很大的转变。这时期的显著特点，是政府主办译事，人们亦了解到西方科学知识的重要。虽然西方的观念对于既成秩序含有潜在的危机，但西洋的技术对于国防的需要，更是急不容缓。因此，译书的动机，多半由于政治和经济利益所促成。如表三所示，当十九世纪后半期，自然科学和应用科学的译作大为增加，构成此期译作总数百分之七十以上。这些译本半数以上是译自英文，其余译自德、法、俄和日本等国文字。政府设立各种机构来训练通事和译书人材，并遣送留学生出国深造。若干具有中文和西文能力的人，都成为职业性的翻译人员。而且，因印刷成为有组织的企业，译作易于出版，并透过译事学校和政府机构，更能达于广大的读者，因而译作较前有更广泛的影响。翻译的方法和技巧，也在广泛的讨论，如题材的选择，名词的标准化，以及各种翻译的分工等。

政府从事翻译西方资料，开始于一八三九年。当时，林则徐在广州雇用一批翻译人员，从事翻译西书和报章上有关洋人的言论和活动，以作情报；特别搜集有关瓷器、茶叶、军事和鸦片的资料，以进呈御览。另外编有一份《华事夷言录要》，即是从外国出版物上搜集关于中国报导的摘要，由袁德辉等负责选材和译述。这些译文的一部份后来收入《四洲志》（一八四一年），经魏源重编，并增入一些译自外国杂志的资料，成为通行一时的《海国图志》（一八四四年）。半世纪以来，此书一直被视为了了解西洋最权威的编著，在中国和日本广为流传。

中国经过几度战败之后，乃于一八六一年决定设立一所语文学学校，定名为同文馆，以造就适任的通事和译书人材^⑦。这所学校后来陆续扩展，增添了多种外国语文，并新开关于科学和西洋制度的课程，根据一八八八年《同文馆题名录》所记载，该年有注册学生一二五人，教习十九人，其中八位属英、法、德、美等国国籍。校中图书馆，有中文书三〇〇册，西文书一七〇〇册，

并有各种语文的报纸和杂志。一八七三年设立一所印刷局，出版译为中文的外国著作，并将此等译作分送各省当局，转发当地官员阅读。在这些译作中，丁韪良（William A.P.Martin）首次介绍了万国公法和西洋法典。一八六九年后，丁氏任该校总教习。其他译作，包括有西洋制度、历史和科学的著作。这些译作都用上等纸张印刷，有的进呈御览。但就数量来说，同文馆译书的贡献较少，在四十年漫长的时期中，大约仅译了二十六部著作，包括未译完和未出版的在内。

一九〇一年同文馆与京师大学堂合并，一九〇三年在该校设立了一所译学馆，有学生一二〇人，授英、法、德、俄、日五种语文，并增添科学、法律和外交程序的课程。但训练期限较同文馆的八年缩短为五年。该馆特色之一，是成立一文典处，主持编纂正规字典，分英、法、德、俄、日五种语文。每种语文有三种字典，即中文——外文、外文——中文，和一种科技名词的词典；每字都注有发音和定义。但因该馆寿命不长，故成就有限。

上海江南制造局于一八九六年将其成立不久的翻译馆与广方言馆合并^⑧，后者系一外语学校，一八六三年成立于上海。这二机构，一从事教学，一从事编译，合作甚为密切，较其他官方翻译机构产生了更多的译作。这翻译馆，到一八七一年，出版了许多关于科学、工程、军事、和其他学科的译本。开始担任翻译工作的，是华衡芳和徐寿。其他西籍和中国学者参与是项工作的，还有傅兰雅（John Fryer）、玛高温（Daniel J.McGowen）、林乐知（Young J. Allen）、舒凤（一位由美国归国的医学生）、赵静涵（一位研究西方医学理论的中国医士）、贾步纬（一位数学家）和徐寿的儿子徐建寅（他于一八七九和一八八四年间曾参观欧洲一些工厂）。就翻译的数量和涉及科学之广来说，诸人中以傅兰雅的贡献最多。他和华、徐、赵及其他诸人合译关于科学的著作达一百三十余种。据傅氏于一八八〇年的报告中称，江南制

造局译书有一五六种，其中出版了九八种，共发行了三万一千一百一十一部。该局的译印工作继续到本世纪初。从一八七一至一九〇五年间，出版译书共一七八种^⑨。

十九世纪末叶，译书风气的热烈，反映在若干私人所支持的社会，专门从事翻译西书。其中较重要的有傅兰雅于一八七五年成立的格致书室，译印了若干关于科学和技术的书籍，其中如《须知》和《图说》最为通行。另一私立机构是译书公会，在一八九七年左右由一批中国学者所创立。该会的目的在于专译西方历史和制度的重要著作，因官方已专注于翻译自然和应用科学的书籍。预定从法、英、日文等书籍中，选译三十部著作，分期刊载于《译书公会报》，该杂志每期发行三千份^⑩。

经过维新运动的激励，一八九五年后若干大学和出版社都参与译事。如上海的南洋公学、太原的山西大学，以及北京的京师大学堂都设立了翻译科。十九世纪末叶与二十世纪初，至少有四十所官办和私人经营的出版机构从事译印。如新学会社专译农业书籍、广智书局专译历史和制度的著作、《小说林》期刊则专译小说。出版社纷纷在上海设立，使该地荟为中国出版业的中心。

四、二十世纪的译书

二十世纪在中国史上是一革命的时代，各种思想制度与文化生活都有激烈的改变。反映在译事上的是学术兴趣的转变。过去数世纪以来，注重翻译自然和应用科学，现在转而热中于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的移译。这新的趋向不仅对现代中国政治和社会的发展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也显示中国知识分子日益了解到要解决中国的基本问题，不能全靠军事和技术的知识，还须具有现代政治、经济和社会组织的综合知识。

当本世纪初期，较多的翻译是在社会科学方面，从一九〇二

至一九〇四年，几乎半数的译作是关于史地、政治经济，尤其教育制度方面的著作，而百分之六十译自日文(见表四)。当时一般

表三 十九世纪后期译书的科目和语文 约1850-1899

科 目	语 文						其他和 不 详	总计	百分比
	英	美	法	德	俄	日			
哲 学	5	1	—	—	—	—	4	10	1.8
宗 教	3	1	—	—	—	—	1	5	1.0
文 学	1	1	—	—	—	—	1	3	0.5
艺 术	1	—	—	—	—	—	1	2	0.3
史 地	25	10	1	1	2	16	2	57	10.0
社会科学	23	5	2	6	—	6	4	46	8.1
自然科学	96	26	3	2	—	32	10	169	29.8
应用科学	123	33	6	16	—	29	23	230	40.6
杂 录	9	5	1	4	—	3	23	45	7.9
总 计	286	82	13	29	2	86	69	567	
百 分 比	50.5	14.5	2.3	5.1	0.3	15.1	12.2		100

附注：(1)表中数字系代表种数，杂志上刊登的翻译文章未包括在内。

(2)资料来源：徐以□《东西学书录》(上海1899)，二册。此书录在一九〇二年增订本中，增入三〇〇种；因该书未能得见，故未检阅。

表四 二十世纪初期译书的科目和语文 1902-1904

语 文 和 国 别									
科 目	英	美	法	德	俄	日	其他和 不 详	总数	百分比
哲 学	9	2	—	1	—	21	1	34	6.5
宗 教	1	—	—	—	—	2	—	3	0.6
文 学	8	3	2	—	2	4	7	26	4.8
史 地	8	10	3	—	—	90	17	128	24.0
社会科学	13	3	3	7	2	83	25	136	25.5
自然科学	10	9	5	—	—	73	15	112	21.0
应用科学	3	3	3	14	—	24	9	56	10.5
杂 录	5	2	1	2	—	24	4	38	7.1
总 计	57	32	17	24	4	321	78	533	
百 分 比	10.7	6.1	3.2	4.5	0.7	60.2	14.6		100

资料来源：顾锡广：《译书经眼录》（杭州，1935）二册，此书目的是继续徐以□的《东西学书录》一九二〇年的增订本。

人关心制度的改革，和日本维新政策的影响，对翻译自有决定性的因素。但是，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对华的侵略态度，经过一段时期的激愤之后，翻译英文的著作再居首位。一九一二至一九四〇年间，四分之一以上的译作是译自西方的文学著作（见表五），其中百分之九十是小说、戏剧和诗歌，其余是文学理论和批评。另外有三分之一以上的译作是关于社会科学和历史，而

表五 民国时代的译书 1912—1940

语文和国别								
科目	美、英	法	德	俄	日	其他和 不 详	总 数	百分比
哲学	164	17	31	11	22	3	248	4.7
宗教	97	10	5	—	11	—	123	2.3
语言	25	2	4	1	1	7	40	0.8
文学	505	210	101	239	174	233	1,462	27.6
艺术	24	4	2	6	15	—	51	1.0
史地	491	37	29	21	53	10	641	12.1
社会科学	763	72	118	42	351	5	1,351	25.5
自然科学	585	25	46	3	112	—	771	14.6
应用科学	311	2	41	3	217	—	574	10.8
总录	23	2	—	—	13	—	38	0.7
总计	2,988	381	377	326	969	258	5,299	
百分比	56.4	7.2	7.1	6.2	18.2	4.6		100

附注：（1）表中数字仅代表译书，杂志上译文未包括在内。
（2）资料来源：平心编，全国总书目（上海：生活书店，1935），此书目从1912—1940所出版新书计二〇,〇〇〇种中，列出4,159种译本；又图书季刊英文版，1935—1940收录译本1,140种。

特别重要的是关于意识形态的著作。马克思主义是在本世纪初首次介绍到中国，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全部中文译本，大约要到一九

二〇年间才开始出现^①。在二十和三十年代，研究新社会科学的兴趣达到高潮，译出了不少关于辩证唯物主义的俄文著作。这些介绍意识形态的译作，为共产主义运动在中国的发展奠定了思想基础。

因翻译科学方面的书籍增加，对于西方名词术语要选择一个与中文相当的字义，就产生很大的困惑。有些学者和有关机构讨论，如何将专门名词和术语标准化。梁启超曾建议：音译可用于人名和地名，意译可用于政府机关，对于科学和技术名词，则创造新字^②。本世纪初，政府的几个有关机构曾从事名词标准化的工作。一九一八年，教育部、中国科学社和若干个别专家共同组成一个科学名词审查委员会，审订了包括医学、化学、物理、数学、植物学和动物学等方面的名词。自一九三一年来，有关医学、生物和化学的三种词典先后出版。

国立编译馆自一九三二年成立以来，先后组成约有三十七个不同的委员会，继续从事名词标准化的工作。直到一九四七年，才拟订出标准化的中国科学名词，共分九十七类，其中三十五类由教育部颁布采用^③。此外，编译馆主要的任务是翻译和出版外国著作，以及将中文著作译为西文。并特别设立一委员会负责选择用以翻译的书籍，且约聘译者。关于西方哲学、历史和文学的著作，已翻译的有亚里士多德、柏拉图、康德、达尔文、莎士比亚、萨可莱（Thaokeray）、易卜生和其他人的名著。到一九四六年，有五十部以上古典和通行的著作译为中文出版。当时正在翻译和印刷中的，尚有一百多种^④。

本世纪中，大多数的译作是由中国人自己译的，没有外籍人士参与。多数中国译者都曾受过外国语文的训练，并各自翻译其所专长的有关学科的著作。若干译者都成为专业者，对于介绍西方思想、文学和技术，他们都有很大的贡献。其中严复较其他早期译者有完全不同的学历背景，他曾受中国古籍的薰陶，也受过

新式教育，并去英国深造，且结识一些西方哲学家。一八九五年甲午战争后，严氏深受刺激，乃于一八九六年开始翻译赫胥黎的《天演论》，由此，达尔文的“物竞天择”和“适者生存”的理论首次介绍到中国。该译本于一八九九年出版，一时风行，并采作学校课本。严氏又译亚丹斯密斯的《原富》（一九〇二年）、穆勒的《群己权界论》（一九〇三年），和《名学》（一九〇五年）斯宾塞的《群学肆言》（一九〇三年）、甄克思的《社会通论》（一九〇四年）、孟德斯鸠的《法意》、和耶芳斯的《名学浅说》（一九〇八年）。这八种西方的经典著作，对现代中国思想产生极大的影响。在翻译技巧方面，严氏创立了信、达、雅的标准，并用古文翻译。为了迎合读者心理，使人不致感到这些新观念全系舶来品，他引用中国典籍中的语句作为解说。可是这种翻译方法，常会曲解原意。当时，京师大学堂的总教习吴汝纶，在给严氏的信中曾批评到：“执事若自为一书，则可纵意驰骋，若以译赫氏之书为名，则篇中所引古书古传，皆宜以原书所称西方者为当，似不必改用中国人语，以中事中人固非赫氏所及知”^⑮。这种争论代表早期译书观念的不同。

早期所译小说中，以林纾对中国读者影响最大。在他之前，传统的中国文学中，小说没有地位。甚至在二十世纪初期，除非这小说是既富趣味，又长于文采，否则少有读者。林纾是第一位用古文翻译西方文学作品的。因他不谙外国语文，全靠他的合作者选材和口译，由他笔述。合作者固非全是上驷之材，因而他的译作常被讥为选材既非上乘，而译笔又每多不当，只是根据一个外国故事的情节，用中文重述而已。这是意译而非翻译。但这些缺点并不能削减林氏对广大读者的影响力。当十九世纪末叶和二十世纪初，林译西方小说不下一七一种^⑯。虽然林译小说大多为后来译者重新翻译，但首先介绍西方小说给中国读者的，还是要归功于林氏。

许多现代中国作家和译者，原来是习科学和技术的，后来转治文学，从事翻译和写作。鲁迅是大家所熟知的，曾在国内习海事和矿务，后来在日本学医。一九〇三年，他开始翻译两篇味纶的短篇故事。一九〇九年，他和乃弟周作人合译《域外小说集》，其中包括安得烈夫、柴霍甫、显克微支、王尔德、爱伦坡、莫泊桑和其他名家的作品。他们起初用古文直译，但不为一般读者所欢迎。据说他们的第一部译作，出版十年后仅售出了二十一本^①。鲁迅后来的译作，改用白话，译了许多俄国和日本作家的作品，如法兑也夫、果戈里、高尔基和潘特烈叶夫诸人的短篇小说，卢那卡尔斯基的《文艺与批评》，爱罗先珂的《童话集》，以及厨川白村和鹤见祐辅的随笔等。周作人以译东欧作家的作品而闻名。

郭沫若于一九二八年译哥德的《少年维特之烦恼》，一九三二年译《浮士德》，尚译有辛克莱、高尔斯华和托尔斯泰诸人的作品，以及译自英、德和俄国诗人的诗歌。其他著名的译者如田汉，译有莎士比亚，托尔斯泰、王尔德和梅特林克等人的剧作；傅东华译了好些文学批评的作品；梁实秋译莎翁戏剧闻名；关琪桐译了若干西方哲学家如笛卡尔、培根、伯克利和休姆诸人的名著。在科学方面，多数译者，专译他们本行的书籍，但也有少数旁及其他。

五、对外关系与译书

两国间文化的交流，常系于两国间政治和经济上的关系，外交关系愈密切，其文化关系亦愈广泛。从十六世纪至十八世纪，天主教罗马教廷与中国的关系是相当独立的，与当时欧洲国家的政治经济的利益无大关系。但这情况只维系到欧洲向外扩张的第一阶段。从十九世纪末叶直至当代，我们可以见到中国对外关系中四个不同的阶段。在这时期中，中国和英、日、美、俄四国的

关系特别密切。这四个阶段正符合中国近代史上的演变，从一八四二年鸦片战争至一八九五年甲午战争，将近半个世纪，英国在中国的势力占着优势。这时期的译作正反映出这个事实。从一八五〇至一八九九年，五百六十七种译品中，百分之五十是译自英国的著作（见表三）。早期的译著如马礼逊、米怜、麦都思、郭实猎、缪耳赫德（Muirhead）、伟烈亚力和其他诸人的译述，大多与英国在华的政治经济利益有关。

从一八九五年中日战争至一九一九年五四运动，因日本维新后的崛起，造成对中国的一大刺激，由于中国衰弱，面对西方列强的威胁，改革运动的主要目标在仿效日本。因而在本世纪初，有一万名以上的学生成群东渡^⑮。更有强调学习东洋和从日文翻译远较从西文直接翻译为便捷者^⑯。结果，这一时期从日文翻译的译作，总数高达百分之六十（见表四）。

日本对中国的侵略，特别是当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引起对彼邦的仇视，因而导致中国再转向西方国家。当时国际形势的变化，使得中国学生们倾向留美代替了留日。密切的文化关系，引致大量翻译美国科学和文学作品。虽然没有数字将美国著者从英国著者分别出来，但自民国成立至一九四〇年以来，英美作品构成译作总数百分之五十以上（见表五）。

在十九世纪，中国与俄国在政治和文化方面的联系，不如英、日、美三个国家那么重要。直到一九二〇年间，才有少数俄国文学和社会科学的著作译为中文。从一九一九至一九四九年，译自俄文的译品约有六五〇种，如以百分之六十七的英文译本来比较，这个数字仅占此期译品总数六千六百八十种中的百分之九·五。自一九四九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与苏联在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都发生密切的关系，大量的翻译俄文著作，成为新政府政策的一部分。据一九五〇年的报导，该年出版各科的译作约有二千一百四十七种，其中一千六百六十二种或百分之七十

七·五译自俄文，而译自英文的著作有三八二种，仅占译品总数百分之十八^②。

其他西方国家，与中国的政治和文化关系都较疏远，译自德文和法文的译作数目，也较英、美、日为少。如表三、四、五所示：译自法文的共计四一一种；译自德文的四三〇种。此外译自其他国家的译品，至少代表二十二个国籍的著者^③，其中以译自意大利的较多^④。

在西方文化输入中国的过程中，日本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从日文译为中文的历史可追溯到一八八〇年，但翻译的重要时期始于一八九五年中日甲午战争之后。自二十世纪初期以来，中国学者译了许多日本著作，特别是关于经济、政法、农业和医学方面的。日本文学创作，由归国的留学生大量介绍，译了许多日本名作家的作品，每人常译有五至十种之多。一九二七年左右，左翼文学在中国兴起，日本资料提供了大量的翻译素材。大约从一八八〇至一九四〇年间，译自日文的二千二百零四种著作中，最高的百分比是社会科学，其次是自然和应用科学，以及文学和其他学科。

因日文对于中国人较西文易于阅读和翻译，许多西方的著作，重新由日文译为中文，如雷马克的《战后》、考茨基的《马克思的经济学说》，以及鲁迅所译的俄国小说，都是由日文转译而来^⑤。作家蒋光慈曾批评道：在日文译本中的一些更改、删节和错误，再转译为中文时，于是就有更多的变动、更改和错误。像这样的译作，怎能保持它原有的形式呢？假如一部俄文作品译为德文或英文时已有一些错误，再译为日文时，又增加一些错误，于是从日文译本再译为中文时，一定是集错误的大成了^⑥。

六、结 语

从十六世纪末叶至本世纪四十年代，除了发表在报刊上许多

翻译的文章以外，估计译书的总数应超过一万种，其中大多数系二十年代以来的产品。虽然本文所搜集作统计的资料未能完备，但相信表中数字足以代表某些学科和语文在各时期的一般趋势。这些译作的确切影响，尽管不易作出正确的估计，但将所涉及的学科和语文加以分析和综合，对于了解译书的一般实际情况和趋势，至少能有一些帮助。

翻译的题材反映一个时期的需要和兴趣。很明显，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在过去译作中占主要地位，其总数达百分之七十，而自然和应用科学仅占百分之二十七（见表六）。这或可说明，一方面那时人们对人文科学较为重视；另一方面，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是一种累积的知识，其所蕴涵的旧知识，不像在科学和技术的领域内，可为新的知识所代替。

总计译作所涉及的科目，文学所占的比例最高。大量移译西方文学作品，大半由于政治和社会改革的动机，而非仅为怡情遣兴。因文学是最通行的大众阅读媒介，许多现代中国知识分子认为它是教育广大群众的最好工具^{②6}。因此，大量输入西方文学作品作为鼓吹社会改革的媒介，就不足为异了。

翻译的素材代表二十五个国家以上的著述，以英、日、俄文的作品为最多，其中有些是转译而非译自原文。有些所谓原著，事实上是根据外国著作的一种或多种底本编译而成。有些译本并非译自该科的最佳选本，且同样一部作品，有时有两种或多种的译本。如此，在译本的品质上，虽然可以比较出优劣，但遗留下其他重要著作未译，反而产生许多重复的译本，毕竟是一种人力浪费。翻译在本世纪三十和四十年代，无论在选材或技巧方面，都有显著的进步，虽然有待改进的地方仍然很多，但总的说来，译书对中国现代化的影响，是毋庸置疑的。

表六 过去数世纪中译书所涉及的主要知识领域

1580—1940

译 书 种 数							
科目	1580— 1790	1810— 1867*	1850— 1899*	1902— 1904	1912— 1940	总 数	百分比
人文学	(282)	(706)	(20)	(63)	(1,924)	(2,995)	39.2
哲学	19	—	10	34	248	311	
宗教	251	687	5	3	123	1,069	
语言	9	19	—	—	40	68	
文学	1	—	3	26	1,400	1,430	
艺术	2	—	2	—	51	55	
社会科学	(19)	(27)	(103)	(264)	(1,992)	(2,405)	31.5
政治	2	2	20	79	448	551	
经济	—	2	14	8	367	386	
教育	4	—	12	54	211	281	
社会	—	—	—	—	325	325	
史地	13	23	57	128	641	862	
自然科学	(127)	(34)	(139)	(112)	(771)	(1,183)	16.0
数学	20	9	34	9	154	226	
天文	89	19	12	—	49	169	

续上表

译书种数							
科目	1580— 1790	1810— 1867*	1850— 1899*	1902— 1904	1912— 1940	总 数	百分比
物理	6	4	15	10	59	94	
化学	—	—	18	9	77	104	
地质	3	—	17	46	50	116	
生物	6	2	28	31	148	215	
其他及 通 论	3	—	15	7	234	259	
应用 科学	(4)	(13)	(230)	(56)	(574)	(877)	11.5
医学	2	13	45	9	220	289	
农业	—	—	46	5	72	123	
工程	—	—	93	10	124	227	
军事 科学	2	—	46	32	118	198	
其他及 通 论	—	—	—	—	40	40	
杂录	(5)	(15)	(45)	(38)	(38)	(141)	1.8
总计	437	795	537	533	5,299	7,601	100

* 此二册中，译书数字有彼此重复处，其中属社会科学者二种，自然科学六种，应用科学五种，共计一三种。

注：

①本文所指翻译，系由原文译为中文而不更改其内容者为

限，除早期耶稣会士的译述难以分别其著译外，其他称为编订之作品或期刊中之翻译文章，均不计在内。

② Henri Bernard, *Matteo Ricci's Scientific Contribution to China*, tr. by Chalmers Werner (Peiping : Henri Vetch, 1935), P.68。

③关于耶稣会士在学术上的贡献，参见方豪：《方豪文录》（北平：上智编译馆，一九四八年）；罗常培：《耶稣会士在音韵学上的贡献》，载于《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一九二九年，第一本第三分册；范适：《明季西洋传入之医学》（上海：中华医史学会，一九四三年）二卷页一上——三上；惠泽霖（Hubert Verhaeren）著，景明译：《王徵与所译奇器图说》，载于《上智编译馆馆刊》（一九四七年），二卷一期，页二六——三六；Alexander Wylie, *Notes on Chinese Literature* (Shanghai, 1922)；Walter Fuchs, *Der Jesuiten-Atlas der Kanghsi-zeit* (Peking, 1943)。

④关于新教传教士的译述，见 Alexander Wylie, *Memorials of protestant Missionaries to the Chinese* (Shanghai: American Presbyterian Mission Press, 1867)；William Milne, *A Retrospect of the First Ten years of the Protestant Mission to China* (Malaaca, 1820)。

⑤ 梁启超：《西学书目表》（上海，一八九六年），卷一，页四下——六上。

⑥ 关于教会出版事业，参见 Gilbert McIntosh, *The Mission Press in China* (Shanghai: American Presbyterian Mission Press, 1895) PP. 35—58；Albert J. Garnier, *A Maker of Modern China* (London: Garey Press, 1945)，P. 77；K. T. Wu (吴光清) “The Development of Typography in China During the Nineteenth Century” *Library*

Quarterly, 22 (1952) PP. 288—301; 杨寿清:《中国出版界简史》(上海:永祥印书馆,一九四六)。

⑦ 关于同文馆的创立及译书经过,参见Knight Biggers-aff, "The T'ung Wen Kuan," Chinese Social and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18 (1934), PP.307-40;《同文馆题名录》(为该馆校历,于一八七九年开始编印,以后每隔数年编印一次);《译学馆开办章程》(北京,一九〇三年),页一八。

⑧ 关于江南制造局译书,参见冯桂芬:《显志堂稿》(一八七六年),卷一〇,页一八一—二〇; John Fryer, "An Account of The Department for the Translation of Foreign Books at The Kiangnan Arsenal," North China Herald, 24 (January 29, 1880);《格致汇编》第三年,第五—八卷(一八八〇年);周昌寿:《译刊科学书籍考略》载于《张菊生先生七十生日纪念论文》(上海:商务印书馆,一九三七年),页四二五—八。

⑨ 其中有关自然科学者六六种,军事三八种,工程和制造三五种,医学一一种,农业七种,历史和制度二一种。关于江南制造局译书全目,参见魏元恭:《江南制造局记》(上海,一九〇五年),卷二,页一五—二二〇。

⑩《译书公会报》,第一号(一八九七年)。

⑪梁启超在一九〇二年第十八号的《新民丛报》中第一次提及麦喀士(即马克思,页二二)。不久即有数部日文著作的中译本,对社会主义有较详的介绍,如赵必振译日人福井早藏著《近世社会主义》(上海:广智书局,一九〇三年。)一九二〇年有陈望道的中文全译本《共产主义宣言》。

⑫ 梁启超:《论译书》见《饮冰室合集》(上海:中华书局,一九三六年),第一册,页六四—七六。

⑬ 一九四七年教育部颁布采用的科学名词，其中包括化学、药剂和药理学、天文、物理、矿物、气象、地质、解剖、细菌和免疫、病理、电机工程、化学工程、普通心理学、社会、经济、教育、统计等，见《中华年鉴》（南京，一九四八年），下册，页一七七三。

⑭ 《国立编译馆工作概况》（南京，一九四六年）。

⑮ 王蘧常：《严几道年谱》（上海：商务印书馆，一九三六年），页三五。

⑯ 林译小说约一七一种，所包括的作家，有英国九九人，美国二〇人，法国三三人，俄国七人，瑞士二人，以及比利时、西班牙、挪威、希腊和日本各一人，尚有五人国籍不明。见阿英：《晚清小说史》（上海：商务印书馆，一九三七年），页二七七—八〇。据马泰来“《林纾翻译作品全目》考订，林译可知者凡一八四种、单行本一三七种、未刊二十三种、八种存稿本。

⑰ 前书，页二八三—四。

⑱ 舒新城：《近代中国留学史》（上海：中华书局，一九三三年），页四六。

⑲ 张之洞：《张文襄公全集》（一九三七年），卷二〇三，页一五上。

⑳ 《翻译通报》，三卷五期（一九五一年），页九—一〇。

㉑ 杨家骆：《一九二三年度图书年鉴》第六编，页一—四四四。

㉒ Pi Shu-t'ang, Catalogo di opere in Chinese tradotte dall'Italiano o riguardanti L'Italia i saggio di bibliografia (Peking: Centvo Culturale Italiano, 1941)。

㉓ 实藤惠秀：《日本文化の支那への影响》（东京，

一九四〇年)，页八——九。

②④ Walgang Franke and Dschang Schau-dien, Titelverzeichnis Chinesischer uebersetzungen Deutscher Werke (Peking: Deutschiang-Institut, 1942)。

②⑤ 蒋光慈：《异乡与故国》（上海：现代书局，一九三〇年），页一三一。

②⑥ 见梁启超：《译印政治小说序》（一八九八年），见《饮冰室合集》第二册，页三四——五；又《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一九〇二年），同上书，第四册，页六——九；鲁迅：《呐喊》（上海，一九二六年），序页四。